

2206.5
Z94

启蒙文学的先驱

——龚自珍、曹雪芹研究

邹进先 著



A095205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上 编

龚自珍生平与思想概说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①在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结合部上，标志着古代传统社会结束和近代社会开端的杰出人物则是龚自珍。他是揭开我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页的先驱者，也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开山手。他的

^①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思想和文学创作直接影响了晚清的一代人。梁启超说：

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文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①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②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鸦片战争后一年。这五十五年间，大体是清代嘉庆、道光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中华民族走向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前夜。

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人称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并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敲响的。鸦片战争所标志的中国的空前的民族危机，积势已久，而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内部。

184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国度。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这种土壤上耸立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政治制度所决定，并为这种经济政治制度服务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仍然潜滋暗长，但是生长非常艰难。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它们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窒息着民族的

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二集，卷六。

②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一切生机。清朝经过康、雍、乾三代“百年承平”的所谓“盛世”，到了乾隆晚期，“盛世”已成了“强弩之末”，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痼疾开始发作。“外似升平，内实蠹坏”，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历史演进变化的联兆。包世臣在《再与杨季子书》中说：“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龚自珍出生的那一年，乾隆皇帝作成《御制十全（武功）记》。作记后的第四年，即嘉庆元年（1796），自湖北开始，后来蔓延数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就正式开始了。这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嘉庆四年（1799），统治中国六十年之久的乾隆皇帝在白莲教大起义的冲击下，在惊悸与焦虑中遥指西南而死，其子嘉庆帝颙琰正式执政。嘉庆执政以后，力图挽救危局，颇有一番整肃之势。他一方面继续派兵镇压白莲教起义，一方面整饬吏治，振刷纲纪。首先杀掉权相和珅，撤换并贬斥了和珅的大批追随者，整顿军机处，终止皇帝南巡传统，通过官方政策和皇帝以身作则来解决国库匮乏问题，改变贵族和官员奢侈懒散的生活方式。但是，嘉庆的这些努力并不能医治封建专制的根深蒂固的弊病。几乎与白莲教起义同时，湖南、贵州又爆发了苗民起义。嘉庆七年（1802），在东南海上，爆发了蔡牵领导的浙闽两省渔民的反清斗争。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在河南滑县和北京爆发。这次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久，但起义军的一支却从西华门攻入皇宫，引起清王朝统治中心的一片混乱。“禁城遇变，人情惶惶，讹言四起，惊扰达旦”^①，“居民仓皇无措者四日”^②。事后嘉庆颁发《罪己诏》，惊呼这一“变生肘腋，祸起

① 兰簪外史纂《清逆记》卷一。

② 昭桂《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萧墙”的事件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①，哀叹“齐豫骚动，阙下震惊，惟椎心挥泪，宵旰仰求上苍赦罪，此外无可言矣”^②。1820年，嘉庆皇帝死于热河行宫，其子旻宁继位，是为道光皇帝。道光上台后，效法乃父，也企图整顿吏治，振刷纲纪，但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嘉道时期，整个社会更加沉滞、恶浊和昏暗，古老的传统的封建社会病入膏肓，生机已尽。

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经济的衰危破败，社会生产停滞萎缩。历代王朝都无法避免的土地兼并，清代在乾隆时期就开始了。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地主、官僚、商人采取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③。“一家有数千家之产，则一家而至失业者数千家”^④。据史书记载，京畿一带的旗地被旗丁卖掉的已超过半数。江南地区到处出现“豪家巨族，田连阡陌，盈千累万”，“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在土地兼并加剧的同时，全国人口也在急剧增长。从乾隆六年(1741)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全国人口从一亿四千万增加到四亿一千万，增加了几乎三倍。按嘉道时期人口计算，在人均口粮只有二石有余的情况下，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洪亮吉就指出，人口增长快于耕地增长，超过社会能够供养的能力，造成米价昂贵和田价上涨，“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比比乎”^⑤！落后僵死的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使得贫瘠的土地无法承载数量如许巨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② 《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十六《责已述怀》。

③ 《嘉庆东乡县志》卷二十三《艺文》。

④ 钱惟诚《养民论》，《皇清经世文编》卷十一。

⑤ 《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大的人口，土地兼并严重进一步造成人口和土地关系的失衡，使得中国出现“人满为患”、“小民艰食”的状况。再加上天灾屡生，河患频仍，情况就更加严重。据记载，嘉庆年间，黄河水患几乎无年无之。人民生活日益困窘，流民遍地。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中说：

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
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狽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菸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饿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清王朝不仅经济凋敝，民穷财匮，而且政治上的腐败也日趋严重。

清代的吏治败坏始于乾隆时期。《清史稿·和珅传》说：“和珅秉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伺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藪，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昭桂《啸亭杂录》中说：“自和相秉政，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为风雅，徒博广大之名，以行狗庇之实，故时风为之一变。”嘉庆初抄没和珅家产，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其总数竟达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两白银，相当清朝当时官库收

入的五倍半。民间谚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诛杀和珅，贪黷之风并未煞住，反而愈演愈烈。潘德舆亦云：“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实不外一利字。”^① 管同《拟言风俗书》中说：“今之风俗，其弊不可枚举，而蔽以一言，则曰好谀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之是趋，无所不至。惟好谀，故下之于上，阶级一分，则奔走趋承，有谄媚而无忠爱。”^② 当时的记载说：“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剥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倾家荡产。”^③ “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恣行不法之事。”^④ 嘉庆初年，毕沅任两湖总督，福宁任巡抚，陈淮任布政使。“毕(沅)性迂缓，不以公事为务；福(宁)天资阴刻，广纳苞苴；陈(淮)则摘人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囊以赠，然后得免。”时人骂他们“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⑤。湖南布政使郑源琇，“凡选授州县官到省，伊即谕以现有某人署理，暂不必去，俟有好缺，以尔署之。有守候半年十月者，资斧告匱，衣食不供。闻有缺出，该员请示，伊始面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细询其故，需用多金，名为‘买缺’，以缺之高下，定价之低昂，大抵总在万金内外。该员财尽力穷，计无所出，则先晓谕州县书吏衙役人等，务即来省伺候。书役早知其故，即携重资而来，为之干办。及到任时，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至于衙役以讼事入乡，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

① 鲁一同《潘先生行状》，《通甫遗稿》卷下。

② 《因寄轩文初集》卷四。

③ 《清实录》卷七十五，嘉庆五年十月。

④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第481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 昭槁《嘯亭杂录》卷十“湖北谣”。

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骇，饘饱始得出门。由此而入族保、词证各宅，逐一搜求，均须开发。迨到案时，不即审结，铺堂、散班之费，莫可限量。盖各有所挟，积渐之势使然也。是以贼盗蜂起，不敢申报；报则枉费银两，不为缉获；获即受贿放去，毫无裨益。谚云：‘被盗经官重被盗’。”^①当时官吏贪赃枉法，求财纳贿，衙役鱼肉乡里，敲剥勒索，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的政治腐败，除了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还表现在官吏苟且因循，阿谀逢迎，尸位素餐，百务废弛。大部分官僚只知优游宴饮，奢侈享受。“都下衣冠之会，无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拜谒阁师，部郎则晋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②嘉道两朝都为皇帝所倚重的军机大臣曹振鏞就是“互相推诿，怠玩因循”的官僚的代表^③，被讥笑为“庸庸碌碌曹丞相”^④。他警告御史“毋多言，毋豪意兴”^⑤。别人请教为官的诀窍，他告之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⑥当时有人写了一首《一剪梅》词讽刺当时官场风气说：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实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道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无庸，驳也无庸。

①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

② 沈垌《与许海樵书》，《落帆楼文集》卷九。

③ 《清史列传》卷三十二本传。

④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四《董曹两相国遗事》。

⑤ 朱克敬《瞑庵杂识》第67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⑥ 朱克敬《瞑庵二识》第119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①

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社会生产停滞萎缩，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民穷财匮。萧一山《清代通史》说：嘉庆时期“凋敝之景况见焉。加之教徒扰攘，沿海不靖，先后靡帑数千万。而河道屡决，不特司农竭蹶，即社会经济亦呈停顿之状态。迨至道光，国力益疲，有清末叶财政之危机，实已胚胎于斯时矣。”“嘉道两朝，为清代由盛转衰之枢纽，亦财政上盈出理乱之最大关键。惟嘉庆之时，虽以教匪海贼之乱，先后靡费无算，然捐事例，收支尚可相抵。至于道光，则一耗于回疆，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而中叶鸦片之战，丧师赔款，国力衰败不可问矣。”^②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一》中所说的“近年财空虚，大吏告民穷，而至尊忧帑匱”，指的就是嘉庆时期的情况。“道光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蓄已经枯竭，……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也已失去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③

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是清代百年承平中潜滋暗长的种种矛盾积重难返的结果。当时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诸如土地兼并、吏治腐败、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底层骚乱、农民起义等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绝非罕见，从形式和内容方面来看都是历代王朝更迭或权力转移时出现的社会症候。倘若在过去，历史势必依照两千年来的发展逻辑消解和克服危机，进入又一

①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册，第353-35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次王朝更迭的循环。然而历史已经进入十九世纪,从世界的时空范围观照中国当时的社会危机,便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迟滞已使这场危机成为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

十五、十六世纪以来,全世界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的确立,正是这一规律的必然反映。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这一时期西方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时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社会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中高歌行进和中国社会经济衰危破败的惨景形成极大的反差,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工业产品的大幅度增加,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寻求国外市场和殖民地。以英国资本主义为首,列强对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侵略,鸦片贸易成了他们掠夺中国财富的吸血管。在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间,仅英、美鸦片商人从中国掠走的财富就达四亿银元,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银价飞涨,银源枯竭,生产破坏。大量鸦片毒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加速了清朝统治的腐烂。许多官员不仅吸食鸦片,麻痹腐化,而且利用鸦片贸易大量贪污受贿。“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5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上偷偷运进了天朝。”^① 资本主义的鸦片侵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社会危机。

恩格斯讲到十八世纪德国的情况时说：“到处是一片混乱。……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逸的王公们，授与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供给主子足够的娇妻美妾就行了。……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的情绪笼罩了全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② 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比十八世纪的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嘉道时期，传统的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危机，集中表现为传统文化的主体的儒家思想文化内部的瓦解趋势。清代的官学是宋明理学，但经学考据学却成为清学的主流。十八世纪，乾嘉学派盛极一时，“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呈现“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③。乾嘉学派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辨伪、辑佚、训诂、考据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倾向是埋头古代典籍，崇古，信古，“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32—63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①脱离社会实际,脱离生产,在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整个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乾嘉汉学完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行程。乾嘉学派的末流,则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方东树《汉学商兑》一书中批判乾嘉汉学“驳杂细碎”,“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张瑛《知退斋稿》中说:“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几于秦近君之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

嘉道时期,汉学衰落,宋学开始活跃。宋学又称理学或道学,重精神思辨,理、气、心性是其研究的主题。理学把伦理道德和儒家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融合为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为维护封建伦常纲纪、巩固封建秩序服务。雍乾以来的皇帝都提倡宋学的程朱学派,宋学一直被清朝作为科举功名的楷式,“百经宗孔孟,百法行程朱”^②。科举考试题目和内容都依据朱熹《四书集注》。但是,宋学在清初已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批判,早已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理学将道德性的“内圣”之学发展到极致,而对社会性的“外王”之道无所贡献。无论汉学与宋学,都不能回应嘉道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提出的挑战。黑格尔曾经指出儒学只不过是空谈“治道”,它与治国并无实际联系,作为儒学经典的孔子著作中一些至理名言在中国反复诵读,只说明是对社会弊端的反省,停滞和僵化的中国横亘在东方,看不出它实际有什

①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惠栋《红豆山房楹联》。

么进步。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看,任何思想文化体系和学说,如果不能回应现实的挑战,不能适应和满足现实的需要,它的命运只能是衰败和没落。

在汉学和宋学衰敝已极的状况下,此时的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新的机运。由于清朝统治力量的衰败,对思想界的箝制相对减弱,厉行百年、充满血与火的大规模的文字狱基本上停了下来。文网放宽,知识分子喘息稍定,一些人开始从故纸堆中钻出来,开始面对现实。孟森先生说:“仕宗尽失(雍乾)两朝箝制之意,历二十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已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① 思想文化界的“生机”,集中表现为“经世致用”的思想重新抬头。最初是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提倡今文经学,企图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找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鼓吹封建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以张惠言、恽敬、李兆洛等人为代表的合力张扬济时实用的“常州学派”,其学术思想虽然未脱出援古论今以至复古的轨道,但是与埋头故纸的“乾嘉”学风已迥然不同。道光初年,魏源代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所题书名、编书宗旨,正标示思想文化界风气的转变,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的重新抬头,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实际、希望变革的心态。

然而,整个嘉道时期的思想文化界毕竟是坚冰乍解,严酷的文字狱使士人余悸犹存。“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还是绝大多数士人的心态。少数睁眼看现实,目光犀利、洞察时弊的才智之士,面对恶浊黑暗的现实,也只能置身冷衙萧斋,报国无门。宋翔凤在道光元年(1821)说:

^① 《明清史讲义》下册第56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数年以来，困于小官，事多不偶，既不能骖骍以合流俗，又不能枯槁以就山林。不平之鸣，托之笑傲，一往之致，消以沉湎。略曲谨而思弃，视齷齪而谁与？于是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屡丛谗讥。故人旧游，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撻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踪剿。古之穷士，抚榛莽以兴叹，送回波而欲泣。考吾所遇，一皆备焉。^①

这种履薄临渊的心态，可以说是当时有思想有见解的士人的普遍心态。初步的警醒与深沉的忧患，悲慨与迷惘，彷徨与痛苦，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龚自珍正是生活在嘉道年间这样的一个昏乱、恶浊、黑暗的时代里，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龚自珍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士大夫家庭。继祖父、生祖和父亲、叔父都是进士或贡士出身的读书人，在朝廷或地方任过官，并且都有经学或文学著作。外祖父段玉裁是当时最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经韵楼集》等。母亲是一位女诗人，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天资聪颖，髫年早慧，在这样一个富有学术气氛和文学气氛的家庭中，从小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童年时期，在母亲的指导下读吴梅村诗、方百川文和宋左彝《学古集》。十二岁，外祖父段玉裁授以《说文》部目，开始学习文字学，进而学习研究经学。他读书涉猎广泛，对诗歌、散文、经学、小说、金石文字、科名掌故、版本目录以及天文地理、释

^① 《香草词自序》。

道典籍都有所探求,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少年奇气称才华”^①,龚自珍十五岁开始作诗,十九岁倚声填词。外祖父段玉裁称赞他写词的文学天才,谓之“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缶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其才绝异。”^②段玉裁又告诫他不可因此妨害“治经史之性情”,要他锐意于经史之学,“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③。然而龚自珍却没有走当时士人髫年学艺、皓首穷经的古文经学派的老路。他少年时期就心仪王安石,好读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④。龚自珍晚年所作《己亥杂诗》所说的“少年揽髻澄清意”,正是他少年时代一腔心事和志向的概括。

就根本而言,龚自珍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孕育的杰出知识分子,怀抱儒家“治世”的理想,以关心世事、改革现实为一生志向。与当时信古媚古、对世事是无关心的经生迥然不同。由于现实风云的激荡,龚自珍二十二岁就写出了《明良论》一组文章,以惊人的洞察力和泼辣的文笔,揭露当时吏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从多方面抉发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大声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此后的二三年中,他又写出了《尊隐》、《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等著名文章,放言高论,批判的笔锋触及当时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经济措施、文化教育政策乃至专制皇权,提出“更法”、“改图”的政治主张。其中《尊隐》一文,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做了鸟瞰式的概括,指出当时已经到了“乱已不远”的“衰世”。这些文章,以“举世莫能及之”的“察微之

① 《己亥杂诗》第321首,《龚自珍全集》第5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本书注文引《龚自珍全集》皆指此书。

② 《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见《龚自珍全集》第597页。

③ 《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见《龚自珍全集》第598页。

④ 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见《龚自珍全集》第633页。

识”，踔厉风发的气概和深切的思想穿透力奠定了龚自珍在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地位，“一线灵光，涌现世界”，成为时代的先驱者。

封建社会士人要实现经世之志，必须入仕做官。龚自珍走的也是传统社会为士人规定的这条事业之路。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首次参加乡试，仅中副榜。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龚自珍第四次参加浙江乡试，考官很欣赏他的才华，称赞其文“规楔六籍，笼罩百家，入之寂而出之沸。科举文有此，海内睹祥麟威凤矣”。称赞其诗“瑰玮冠场”^①。龚自珍中式第四名举人。此时他二十七岁。接下来参加进士考试，就十分不顺利了。

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二十八岁，首次参加会试，不中。这一年，他在北京结识著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刘逢禄著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公羊春秋何氏释解诂笺》等书，发挥《春秋》“微言大义”。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曾有诗述及自己的兴奋心情：“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②这一年，他还结识了另一位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宋翔凤。龚自珍对宋翔凤的学识也极为钦佩，称之为“奇才朴学”^③。在《投宋于庭翔凤》一诗中又说：“游山五岳东道主，拥书百城南面王。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对龚自珍有很大影响。也是这一年，龚自珍在京结识了魏源。魏源是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与龚自珍志同道合，两人成为终生好友，时人合称“龚魏”。魏源

① 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见《龚自珍全集》第602页。

② 《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龚自珍全集》第441页。

③ 《己亥杂诗》第139首，《龚自珍全集》第522页。

后来撰《圣武记》，龚自珍曾赠联语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①

嘉庆二十年(1815)，龚自珍第二次参加会试，不中，以举人选内阁中书，次年到职。这是龚自珍进入官场之始。他在内阁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统志》，任校对官，开始研究历代典制和輿地。对西北塞外部落源流、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尤役心力，曾写有《西域置行省议》，针对当时中国人口膨胀、经济凋敝以及边疆动乱和沙俄侵略日益迫近，提出在新疆置行省，移民实边，足食足兵，防止沙俄侵略。这一主张未被采纳。龚自珍后来在《己亥杂诗》中提起此事时说：“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龚自珍不幸而言中，在写《西域置行省议》后五十年，即同治十年(1871)，沙俄入侵新疆。李鸿章在《〈黑龙江述略〉序》里曾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尤其荦荦大端者。”这个时期，龚自珍还撰写了《最录平定罗刹方略》。其目的与撰写《西域置行省议》一样，在于提醒人们注意防止沙俄侵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即将来临的民族危机的清醒预感。

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又参加了三次会试，皆未考中。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中第九十五名。殿试《对策》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当时政治措施、治理黄河、选举人才、西北边防诸方面提出革新建议。龚自珍晚年所作《己亥杂诗》中写到此次考试时说：“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他

^① 魏季子《羽琇山民逸事》。